

冀東報史資料

專輯之二

外號

新唐山日報

勞動通訊 2



自 录

报 纸 史 料

- 一、《救国报》与文艺……………陈大远（2）
二、《冀东日报》大事记……………新闻研究组编（9）

报 纸 工 作 回 忆

- 三、回忆在《救国报》工作的日子……………丰 原（12）
四、抗日战争时期《救国报》社
 三出长城的回忆……………徐 楠（19）
五、我和《救国报》……………董雪原（23）
六、油墨事件……………王雪松（28）
七、《冀东日报》由农村转入城市的
 一段回忆……………叶 遥、史向荣、李远（32）
八、《冀东日报》——我革命生活的起点……………邹 仆（46）
九、争分夺秒，提高新闻的时效
 全国解放初期，《唐山劳动日报》为提高报纸的
 新闻时效所做努力的一段回忆……………石凤山（54）

访 问 记

- 十、回首艰难创业时
 ——访《救国报》诞生地芦各寨
 和鲁家峪……………肖 铃（59）
 生地（照片、速写）……………赵锡复、张大放



《救国报》与文艺

陈大远

1941年，冀东抗敌文化社出版了一个八开四版的油印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刊登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论文等，以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这在当时，是冀东唯一的文艺刊物。1941年底，抗敌文化社解散了，《文艺轻骑队》也随之终刊。此后，救国报社就兼作一些文艺工作。

一、《救国报》的《老百姓》 刊登了一些文艺作品

《老百姓》报是救国报社出版的时事性的通俗报纸，这个报纸也刊登一些歌词、散文、漫画、连环画以及其它形式的通俗文艺作品，如快板、顺口溜等。但这些作品都是紧密配合当时的战斗任务和时事宣传的。这些文艺形式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老百姓》的第一任编辑是李海平（原名杨海峰，丰润人，后化名林岩，1951年病故），李海平同志1941年冬调离报社后，由布于（原名傅惠轩，丰润人，1942年牺牲）任编辑。布于同志牺牲后，由丰原同志任编辑。

二、《国防最前线》刊登过 一些文艺性的评论

1941年，救国报社兼管综合性刊物《国防最前线》，这个刊物不是文艺性的，但也刊登过一些文艺性的评论和综合评述。在当时，除了党刊《坚持》以外，这个刊物是唯一的群众性的刊物。1942年4月，敌人实行“四次治强”时，该刊停刊，以后未再恢复出版。它的编辑是史诺、沈同、山桥。

三、报社的业余剧社

1941年冬季，报社长驻遵化鲁家峪的东峪（化名五合）和北峪（化名江滨），环境比较稳定。报社的同志们为了同驻地群众加强联系，开展群众文化生活，并起到宣传抗日的的作用，成立了一个业余剧社叫作“铁骑”剧社。

同志们利用业余空隙，作了许多演出的准备工作。以范捷民同志（原名尹铭钰，曾化名齐树德，1942年5月牺牲）为主，集体编写了一个小型歌剧《黄二嫂》，叙述了一位不愿负担战勤任务的妇女黄二嫂，在各方面的宣传帮助之下，转变了错误态度，成为积极分子的故事。这个小歌剧，为了通俗易懂、便于流传、便于排演，利用了已为群众所熟悉的抗日歌曲和民间小调进行填词。

同志们还编写了一出驴皮影戏《巧遇》，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和当伪军的下场。

此外还准备了一些小节目，如抗日歌曲演唱，单折京剧

《坐宫》等。

1942年初，同志们在驻地群众积极协助之下，在江滨搭了一个临时的简易舞台，进行演出。演出之前，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鲁家峪。演出时，观众十分踊跃，会演唱皮影戏的农民，纷纷前来助演，《巧遇》演出未及三分之一时，报社的皮影演员就被农民们所代替。鲁家峪大庄（化名鲁进）的巩俊海同志，是一位当过多年皮影戏演员的名手，他一参加演唱，给这出皮影戏增色不少。后来，即1943年他参加了冀东“新长城影社”，成为专业皮影戏演员。

当然，报社业余剧社的演出，是十分仓促，物质条件十分不足，演出水平也是十分低下的，只能算作报社人员与驻地乡亲们的文娱联欢晚会。但是，即使这样的演出，也受到群众和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有些村纷纷邀请报社业余剧社前去演出；丰玉遵县政府捐助了两匹大布，供剧社作舞台布幕之用；许多县区的地方政府或捐助几十件服装行头，包括古装戏和现代戏的服装，或捐助两桶煤油供剧社演出时点煤汽灯之用；或捐助整套锣鼓供剧社演出皮影戏和旧剧的武场之用，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地需要抗日的文艺生活，使报社业余剧社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

这次演出之后，业余剧社准备第二次演出，并决心提高演出水平。丰原同志搜罗到一本来自晋察冀的话剧本《铁军》。剧社翻印之后，即分配角色，进行排练。剧社同志也新写了一些抗日歌词，自己谱曲，并练习演唱。有的同志准备新编一出皮影戏，并进行文武场的排练。

但是，还没来得及演出，4月中旬，敌人开始实行“四次治强”，血洗鲁家峪。报社同志们不得不突围转移，业余剧

社接受的物资全部被敌人劫走和彻底破坏，业余剧社也就被迫结束了。

四、业余文艺刊物《铁骑》

1943年春，救国报社在迁西西水峪一带活动，环境再次好转。报社的一些同志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组织“铁骑社”，在宣传部长吕光同志支持鼓励之下，编辑出版了三十二开本的油印文艺刊物《铁骑》，刊登一些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文艺论文。

铁骑社的成员有管桦、任朴、武迎山、山桥、陈大远、徐楠等。顾宁同志（救国报编辑负责人，原名牟伦扬，湖北利川人，曾用化名司马军城、殷可汉，1944年春牺牲）被聘请为顾问。

《铁骑》出版两期之后，受到读者和领导的重视。该刊曾刊载新华社播发的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下连队的论文，致使一些文艺工作者纷纷下去，到实际中去体验生活。如报社美术干部王扶轮同志，就自请下连队，并兼任某连指导员，后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

吕光同志根据《铁骑》的影响，产生一个新的设想，认为冀东应有一个群众性的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组织。这个设想很快得到冀热边特委的同意。吕光同志提出，成立这样一个文化组织，应由这个组织出版一种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综合性文化刊物，《铁骑》社就可以作为团体会员，《铁骑》的内容，可以包括在这个综合性刊物之内。铁骑社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铁骑社”解散，《铁骑》停刊，去参加这

个新的文化组织。

五、“新长城社”的诞生和 《新长城》的问世

在吕光同志的倡议之下，1943年夏，冀东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在迁西县东水峪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冀东各个有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同志参加，吕光同志主持，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组织原则，命名这个组织为“新长城社”，决定出版一个综合性文化刊物《新长城》。大会选出若干名理事，有吕光、李杉、顾宁、孔祥均、何畏、季林、张荫青、俞芬、魏仲、陈大远、程立群等同志，吕光同志任理事长。《新长城》由顾宁同志兼任主编，陈大远兼任编辑。实际上，救国报社成了“新长城社”的办事机构，《新长城》刊物也由报社代编代印，形同报社任务的一部分。

《新长城》除了刊登理论、教育、文化、宣传、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文章之外，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顾宁的长诗《哀罗马》，林采的长诗《云》，任朴的诗《二月》等。

1944年10月，吕光同志和一些理事李杉、俞芬、魏仲等同志，在杨家铺战斗中牺牲了，顾宁同志早在同年春季牺牲。杨家铺战斗之后，新长城社停止了活动，《新长城》也被迫停刊了。这个组织和刊物，虽然只有一年多的寿命，但是对冀东的文化、文艺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六、报社对“新长城影社”的协助工作

1943年新长城社成立之后，吕光同志考虑到广大群众需要文艺生活，皮影戏是冀东广大群众最熟悉最欢迎的，又是最轻便最便于打游击的一种演出形式，仍决定成立一个皮影社。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受到著名的老皮影戏演员们的响应，纷纷参加。先后参加的有：苏旭、苏勉、张茂兰、张桐林、巩俊海、李林（刻制皮影人的艺人）等。人员初步齐备的时候，1943年7月，在迁西黄槐峪举行成立大会，吕光同志亲临大会并作了讲话，为影社命名为“新长城影社”。

领导上任命木子厚同志为社长，报社编辑陈大远兼指导员。吕光同志向陈大远提出的要求是，除了作些政治思想工作之外，要立即着手写出几个宣传抗日的皮影剧本。陈大远写出第一个剧本《田玉从军》，以后又写出《锦上添花》、《春秋镜》等，并改编旧影卷《花木兰》。同时组织皮影演员编写剧本。另外，陈大远和报社美术干部王扶轮同志，还帮助李林同志设计绘制现代皮影人的头渣，改善布景所需要的刻件。影社成立之后不久，就在黄槐峪进行第一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年的十一月，敌人对黄槐峪、东水峪一带进行“扫荡”，报社必须转移，影社也需要改变活动方式，进行游击演出。领导上任命报社编辑山桥同志任影社专职指导员，他的任务也是，一做政治思想工作，二要编写皮影剧本。在他任指导员期间，组织编写了不少剧本，有：《光明之路》、《抢粮》、《抓丁》、《大生产》、《四十里铺之战》、

《埋伏战斗》等。同时，他们还把受群众欢迎的歌剧、话剧、小说，象《白毛女》、《血泪仇》、《晴天》等，改编为皮影剧本。

“新长城影社”是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不是救国报社的所属单位，但是报社的同志们，对该社成立前的筹办工作，成立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组织编写剧本的工作，设计绘制新皮影人的工作方面，给予了不少具体的协助。

七、通俗文艺读物的出版

1944年杨家铺战斗，吕光同志牺牲之后，报社失去了领导，翻印政治读物的工作，《新长城》的编辑出版工作，都被迫中止。除了出版报纸之外，如何多作些宣传工作，这是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权衡，以“新长城社”的名义，出版了一些通俗的文艺读物。这些读物有自编的，如《父与子鼓词》、《离弦外史》，有集印的，如《新今古奇观》。这些小册子的一部分，由敌工工作部门发往敌人据点，起些对敌人揭露、瓦解的作用。这个工作到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就中止了。



《冀东日报》大事记

(征求意见稿)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冀东日报》大事记，是根据一些曾参加《冀东日报》工作的老同志提供的口头材料和参阅《冀东日报》写成，内容很不充实，希望大家提供情况，不断补充修订。尤其是曾参加《冀东日报》工作过的老同志多多提供材料，以便把这个大事记编得更加完善、充实、准确。

1946年5月15日，《长城日报》改名为《冀东日报》。这一天的《冀东日报》在一版报角登有一则本报更名启事。启事全文是：本报自298期更名为《冀东日报》，《长城日报》之名即行取消。这则更名启事，在1946年5月15、16、18、20日的《冀东日报》一版上，连续刊登四期。《冀东日报》一开始是四开四版。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进攻冀东解放区。《冀东日报》撤出遵化城，转移到遵化县城东南夜萌峪一带。以后，又由夜萌峪转移到迁西县东营、大河山、松岭等地。在转移期间，出了几期十六开的《冀东日报》临时版。

1946年秋，吴明同志任《冀东日报》副社长。（社长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同志兼）。不久，报社迁回到遵化县富家城，在富家城学习党中央新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准备发动群众土改。

1947年4月4日，《冀东日报》开始创办副刊第一

期。在此之前，报纸没有副刊，全是消息、通讯、言论等。副刊第一期发表了“开始的话”。话中说：“日报特辟副刊，作为大家的园地，其目的是为大家服务，其性质是综合的，其方针是：大家看、大家办。”副刊的名称有：《生产副刊》、《文艺副刊》、《教育副刊》、《卫生副刊》、《经济副刊》。

1947年夏《晋绥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的长文。8月13日，《冀东日报》转载了此文，并配合发表了《客里空》一剧全文。接着，在报社开展了反对客里空运动。

1947年下半年，报社在东营时，当地县委正式把东营和大河山这两个村的土改工作，交给报社负责。在孔祥均同志指挥下，在土改工作中，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土地法大纲，和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东营和大河山两个村的土改工作很有成绩，没有出什么偏差，得到万民拥护。

1947年9月1日，记者节来临，《冀东日报》为悼念在冀东死难的新闻工作者，在第四版上简要介绍了吕光、李杉（崔林）、顾宁、布于、张大雨、唐炎、范捷民、杜风、寒潮、杨玉环等烈士的事迹。

1947年10月，冀东区党委在遵化十里铺召开土地会议，讨论贯彻《土地法大纲》。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搬石头”。根据这个决定，1947年12月，杨林（原冀东十四地委宣传部长）调任《冀东日报》社副社长。孟广平（原十四地委组织部长）调任《冀东日报》编辑部部长。

1948年6、7月间，傅作义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报社又一次转移。在转移中，印刷厂部分设备被敌人烧毁。《冀

东日报》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期石印版和十期八开的临时版。
7月21日，恢复正常出版。

1948年6月，在遵化县孟家铺召开了一次有《冀东日报》社全体干部参加的总结大会。会上，报社同志对杨林、孟广平在新闻工作、土改工作、干部工作中所搞的一套左倾作法，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1948年10月22日，《冀东日报》第二次改组，杨林、孟广平调走。岳欣同志继杨林之后任《冀东日报》社副社长。

为了欢送调走的同志和欢迎新来的同志，《冀东日报》在23日开了一个茶话会。冀东军区文工团还来报社演出了《王宝山参军》等文娱节目。在茶话会上，区党委宣传部长张达同志就报社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讲了话。

1948年初冬，唐山解放前夕，《冀东日报》为配合我东北野战军进关作战，派出了由王重五、史向荣、李远、叶遥组成的前线记者组。

1948年12月12日北方工业重镇唐山解放，新华社冀东分社，用手摇发报机当即向新华总社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1949年1月底，《冀东日报》离开遵化，全体人员步行迁住唐山近郊屈家庄。

1949年4月下旬，《冀东日报》由屈家庄迁入唐山市内。5月1日开始，《新唐山日报》与《冀东日报》合并，继续以《冀东日报》之名出版。

1949年7月31日，《冀东日报》终刊。共发行了1138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冀东日报》全体干部和报社印刷厂工人，转入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唐山劳动日报》的出版工作。

回忆在《救国报》工作的日子

丰 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1933年，日寇又向我冀东进攻。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日寇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1935年，日寇公开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我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残酷镇压，中华民族濒于危亡。1938年，冀东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李运昌同志的具体组织下，举行了中外闻名的冀东二十万人民抗日大暴动。部队西撤后，敌伪配合对我发动了猖狂进攻。汉奸特务横行，环境格外残酷起来。

冀东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一再领导过农民暴动，是有群众基础的。部队西撤后，虽暂时受到一些挫折，但经过努力，基本上保存了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党和群众组织也较快地恢复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急需加强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1939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办一个全区性的地方小报，并命名为《救国报》。

《救国报》是1940年元旦创办的。党派崔林同志（原名马宗舟，后化名李杉）负责。地址暂定在遵化县芦各寨村（化名源河）尹福卿家。

当时冀东仅一些有基础的村庄有我党的组织在工作，

其他广大地区尚未开辟，敌人十分猖狂。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不可能公开，必须隐蔽活动。因此，在芦各寨是以隐蔽方式从事地下办报工作的。

芦各寨的尹福卿在遵化是位开明仕绅。他以较进步的方式经营果园和其他副业。他有四子。因环境残酷，他本人和其他三子都不在原籍，只有长子尹铭枢在家主持。在当地，尹铭枢也有一些名望。日寇认为这样的人，是较为可靠的。但尹铭枢本人由于受我党的宣传教育，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曾经多次掩护过我党的同志。为此，报社地址就选在他家了。

报社初建时期只有五位同志。加上后到的我共六人。崔林任社长兼编辑，伪装小学的教员。学校的孩子们叫他马老师。他当时二十多岁，对党忠诚，工作有魄力，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范捷民（原名尹铭玉）是本村人，尹铭枢的同族，也是以小学教员身份出现的一个英俊青年。他工作积极，对人热情，负责报纸的刻写。杜风（原名冯国玺）是尹家果园的正式养蜂工人。健壮的身体，兼有农民和工人纯朴厚道的气质。为人和蔼可亲。他白天养蜂，夜里负责收录新闻和电报。刘敏同志（原名严德成）家住芦各寨后街，在村中他以行商的面貌出现。为人直爽，工作泼辣肯干，负责采购发行，经常多方设法采购报纸所需的材料。海山同志是李杉同志的警卫员。他和李杉同志有秘密联系方式，不经常在芦各寨活动。

我是1940年冬到冀东游击区的。党分配我到报社工作。记得是一个阴霾寒冷的冬天，李杉和海山二位同志亲自到鲁家峪来接我。当我见到李杉时，他穿一件半新的长袍，文质

彬彬，十分象一位小学教师。他对我非常诚挚爽直，给我介绍当时游击区的情况。海山同志虽是普通农民的衣着，却有着一种雄纠纠的英武气概。我初从大城市到游击区，无处无事不使我感到新鲜愉快。见到他俩，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敬佩心情。一路上，我们边谈边走。我贪婪地欣赏着农村的田野风光。到了芦各寨南山，遥望芦各寨，已是家家灯火了。这是我永难忘记的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天。

在芦各寨我以尹铭枢爱人的妹妹面目出现，从唐山来住亲戚，探望姐姐。

到芦各寨后，李杉同志很快地给我介绍如何隐蔽，如何进行工作。我做他的助手。实际是他的学生。跟他学着编写一些稿件。他耐心地给我讲解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地区工作开展情况，教我应用什么形式和语言编写东西。每当我写成一篇稿件后，他逐字逐句地修改讲解。我所以能较快地参加报纸工作，起到一点助手作用，都是他亲自把手教出来的。

当时我们的稿件来源一是杜风同志深夜收听的莫斯科的纪录新闻和国民党的广播，一是李杉同志和党组织联系，特别是和徐志同志联系，由他们供给一些重大消息及一定时期的宣传要点。另外在军队和地方以及敌人的内部我们都有一些特殊的和一般的通讯关系，为我们提供消息。报纸就凭藉这些材料来编辑出版。报纸因种种困难，不能定期，大约五、六天左右出一期。李杉同志编写一些小社论、工作指导性的文章以及国际国内较大的动态和胜利消息等。我协助他写一些报道。

我俩编写排版后，交给范捷民。他密密地在家中刻写。印刷发行是在后街刘敏家中。他后院有两个放白薯和萝卜的

地窖。我们将此二洞深部挖通作为印报发行工作室。因洞口细窄，不能放入桌子，就在洞的中间和周围留了许多土台作为桌子和存放材料之用。我们的工作昼伏夜出，以隐蔽方式进行的。每当夜深人静，捷民刻完腊纸，除杜风同志外，大家聚在后街刘敏家中。这时大家顾不得闲谈，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裁纸、印刷、数片、写封签等工作。李杉同志和大家一起动手，一面紧张的工作，一面布置下期的工作，和大家筹划着纸张、油墨等物资供应，有时也对每人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同志们从入夜一直紧张地工作到破晓。黎明时，我们才一个个从洞中出来。当我们走在万籁无声的田野里，走在寂静的山村小路上，那清新的空气和山村的景色多么令人陶醉迷恋。但为了怕遇到早起的农民，我们谁都不敢稍有贪恋，疾步如飞地匆匆跑回各自的住所。

报纸印出后，为了不暴露芦各寨的目标，都是由刘敏同志亲自秘密背到离芦各寨数十里以外一带村庄开始发行。

记得是1941年春天，李杉为了约大家，以到南山果园看看标本不期相遇为名，在南山聚会。果园里只有尹家果园工人在工作。嫩绿的枝叶、初绽的花蕾覆盖着南山，远远望去，好象浩瀚无边绿红相间的海洋。久锁在庭院，过着伪装生活的我们，看到这个广阔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真是心旷神怡。工人们忙于整枝工作，适逢没有外人，我们五人（海山同志未来）先后来到南山前厅，这次没有更多地研究工作，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着彼此的身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目前的感受，对未来对胜利的向往和憧憬。李杉同志给大家讲述地方工作的开辟和发展、军队的胜利、群众抗日的情绪高涨等。南山果园的聚会，是报社同志在芦各寨仅有的一次永难忘怀

的愉快聚会。

时光飞逝，瞬间已是1941年初夏，当时冀东地区的开辟工作顺利发展，形势有较大的转变。丰玉遵、迁遵兴、丰玉宁等县很多村庄，已是在我控制下的两面政权，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已公开和半公开地活动了。

报社在芦各寨一年多来的活动，虽说是极端隐蔽保密，但在本村邻村和一些有关系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些暴露，人们有些风言风语，这就引起了敌人对这一带的注意，大约是五月的一天，敌人对芦各寨尹家进行了一次搜查，搜查出一些较可疑的物资并带走了尹铭枢大哥。因为他是当地较有头面的仕绅，破绽又不大，经过多方面的疏通，敌人终于把他放回来了。

报社在芦各寨的地址已暴露，又基于冀东形势的好转，经过上级的同意，报社决定西迁。经过几度的转移，在敌寇的扫荡下，又出了两期报，大约在七、八月份，最后到了鲁家峪。当时的鲁家峪已成为广大的游击区中一块小小的根据地了。

回顾《救国报》的初建时期，一年有余，由于环境残酷，和上级党组织联系较少，国内外及地方新闻来源困难，物质供应极端匮乏，又是伪装秘密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艰巨困难的。在这一时期《救国报》共出了几十期。就这一张八开两页不定期的油印小报纸，它却使党的声音传遍了冀东广大的平原和山区，长城内外，滦河西东，甚至敌伪的据点。每个村庄的人一见到《救国报》都争相传阅，它坚定了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在建立党的组织、开辟地区工作和组织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在办报方面，摸索了一些宝贵经验，